

论刘体仁的纪游诗

陈慧慧^{1,2}

1.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1

2. 闽南师范大学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刘体仁一生游历广泛，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其诗歌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情感表达由江南时期的细腻温婉转向北方时期的雄浑豪放；意象选择从吴越时期的清丽意象转变为山西等地的雄奇景象；语言风格亦由颍州时期的清新自然、善用修辞，演变为北方时期的质朴刚健、多用夸张对比。

【关键词】：刘体仁；纪游诗；地理空间转移；风格

DOI:10.12417/2982-3846.26.01.002

刘体仁(1617—1676)，字公勇，号蒲庵，著有《七颂堂集》，颍川卫(今安徽阜阳)人。其家族早年军功起家，至七世由武转文，研学儒家，参与科举，呈现诗书传家的局面。入仕后，刘体仁任职京师，由于生性喜交游，促使其足迹遍布江南水乡与中原腹地。顺康年间，他因仕途调动频繁往返于江浙与京城之间，途中所见山川形胜、市井风貌皆化作笔下意象。晚年的隐居生涯更强化了家乡的描绘，通过描写家乡人民的晨昏耕作与乡亲间的质朴情谊。当今学界对刘体仁诗词研究较多，对其纪游诗缺乏系统梳理。本文拟从纪游诗角度，梳理其艺术风格和不同地域下的纪游诗特征。

1 刘体仁纪游诗的区域流变

从时间维度看，刘体仁的纪游诗创作可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其宦游经历的地理轨迹。早期诗作集中于江南地区，如吴越、南京等地的游历记录，语言风格以工整对仗见长，多采用典故与传统意象，反映出其对古典游记范式的继承。中期作品随仕宦足迹北上至京师等地，诗中开始出现对地域文化差异的敏锐捕捉，句式趋于灵活，对北方风物的描写展现出雄浑之气，这与其宦途境遇的转变形成呼应。晚年隐居时期，诗作地理范围收缩至家乡颍州，但诗风转向清旷闲适，对自然景致的刻画更趋细腻，体现出地理空间固化与艺术成熟度的同步提升。

地理空间的转移对刘体仁诗风的塑造呈现多重效应。首先，南北地域的自然特征差异直接影响其意象选择与情感投射。江南水乡的温润气候孕育了其早期诗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柔美意象，而北方军事重镇太原的苍茫地貌则催生出“四山封锁”“战事之多”的壮阔画面。其次，地理迁徙带

来的文化碰撞促使其艺术语言的革新。如在游历太原时，诗人联想到自己年少经历战乱，易守难攻的地形引起了作者对边关战乱的思考。看到边关“结发谈兵事”“商歌过战场”忆起年少的杀戮场景，伤痛之感油然而生。这种表达方式的突破与其对晋中独特地形的直观体验密切相关。再者，长期宦游形成的地理流动性，使刘体仁在时空转换中发展出独特的时空观照视角。“刘体仁诗歌宗法晚唐，诗风刻削有力而又不失神韵”^[1]，其诗中常见“故园遥望”“客途新识”的时空对位结构，通过地理空间的物理位移与心理空间的虚实交织，构建出多维度的审美空间。这种创作手法的形成，既是对纪游文学传统的继承，亦是地理迁移经验催生的艺术自觉。

2 刘体仁纪游诗的分类与主题

第一组：太原地区。刘体仁赴西北游历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去太原。在去往太原的途中，刘体仁作诗九首，如《将至太原有怀青主先生》《井陘》《过固关》

将至太原有怀青主先生

驱车溪路曛，曲折近青云。恐采遥峰药，鸾声不可闻。黄冠酬岁月，朱鸟荐芳芬。末俗生何晚，能无幸识君。

过固关

前路人烟少，禾残八月霜。夹天通险隘，积铁削崖苍。疲马窥形胜，商歌过战场。倦心投暮鸟，山驿野烟凉。^[2]

刘体仁的纪游诗《将至太原有怀青主先生》《井陘》《过固关》等，清晰记录了其从京入晋的行进路线：经井陘、固关，沿滹沱河、娘子关一路向西。山西作为独立地理板块，其环境

作者简介：陈慧慧（1992—），女，安徽阜阳人，阜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闽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诗词新唱’对传播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应用研究”（2024AH053027）

特征显著：一是“四山锁闭”，东依太行、西靠吕梁、南屏中条、北峙恒山；二是“盆地如珠，河流如串”，滹沱河作为重要水系，与黄河共同构成区域水文骨架。这种“表里山河”的地貌，使其成为天然军事屏障，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刘体仁的诗歌正是对这一地理与历史特质的文学映射。

第二组：吴越地区。刘体仁在吴越的创作，从内容上看，一类写风光，一类写唱和。其中《金陵雨怀次元昭先生韵》如下：

金陵雨怀次元昭先生韵

疑云度岭蔽炎晖，雨遏鸣蝉五月稀。梦续昼帘人中酒，荷闻夜枕客思归。马头山好吟思远，湖上花繁兄弟违。渐向沧波说宿志，安能黄皓起高飞。^[2]

吴越地区的诗歌，意象的选择极具江南特色与柔美质感。诗中选取了“疑云度岭”、“雨遏鸣蝉”、“夜枕”、“荷闻”、“马头山”、“湖上花”等意象。这些意象不同于北方山川的雄奇险峻，而是充满了江南水乡的湿润、阴柔与静谧。特别是“梦续昼帘人中酒，荷闻夜枕客思归”一联，通过“昼帘”、“中酒”、“夜枕”等室内与身体感受的细节描写，营造出一种慵懒、感伤的氛围，将客居他乡的愁绪表现得深婉动人。

其次，情感表达含蓄细腻，点明了思念友人与思乡的主题。这种情感并非直白的呼号，而是通过“渐向沧波说宿志，安能黄皓起高飞”的委婉自嘲与无奈来呈现。在烟雨朦胧的金陵，诗人的心境也随之变得敏感、细腻与缠绵。

第三组：颍州地区。颍州是刘体仁的家乡，其一生三仕三隐，三次辞官后，均到颍州闲居。在颍州时期创作了《慧湖丛笔》《秋日游直溪》《秋日携家游橡林》等。

慧湖丛笔

落日云木变，潭曲沉花影。隔堰闻桔槔，遥怜匏叶冷。倚辑恣偃仰，碧天转明迥。城中晚钟出，村舍鸟雀静。不才就田野，晨夕意独逞。向夜候明月，孤琴在渔艇。

慧湖地处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毗邻颍州西湖。作者通过“落日”、“桔槔”、“晚钟”等意象，勾勒出家乡田园静谧安闲的黄昏景致。诗人以“倚辑恣偃仰”的闲适姿态与“孤琴候明月”的独得意趣，生动展现了其远离尘嚣、寄情山水的隐逸情怀，体现了归隐家乡后获得的真正精神自由。刘体仁在颍州地区先后游玩过直溪、慧湖、颍州西湖、橡林、朗园等，这些地方都是他诗文里的地理元素，展示颍州乡村风情，富有生活气息。“溪直蒹葭岸，荇荒橡榭林”（《秋日携家游橡林》）“落日云木变，潭曲沉花影”（《慧湖丛笔》）“直溪束天色，湍激橡林左。一仗隐荒绿，日斜风婀娜”（《秋日游直溪》）。王士禛《居易录》曰：“公勇诗颇有奇句，如云：‘直溪束天

色，湍激橡林左’，刻削，极似东野语。”^[3]刘体仁在颍州的创作，使用自然素净的口头语言，避免华丽的辞藻和矫揉造作的修饰，使诗歌显得朴素而真实。擅长选取大自然中常见的物象“蒹葭”“榭林”“晚田”“翠禽”，描绘自然风景和生物来展现其灵秀之美。除了自然风光，还多次描写乡村淳朴民风。

3 地理空间转移对刘体仁诗歌风格的影响

3.1 地理空间转移对诗歌情感的影响

刘体仁作为活跃于清代中期的纪游诗人，其创作轨迹与地理空间转移存在紧密关联。王士禛在《香祖笔记》中提到：“康熙初，诗人挟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鼎孳公，次即谒汪苕文琬、颍川刘公勇。及予三人。”^[4]在长期的宦游与山川跋涉过程中，地理环境的转换对其诗歌情感表达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情感基调的多元性、审美意象的地域化特征以及文化认同的矛盾性等层面。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行于歌诗矣。”^[5]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深刻塑造了诗歌的情感表达方式。当刘体仁游历吴越地区时，其诗歌中渗透着士大夫阶层对山水文化的审美愉悦；而踏入晋中军事要地后，“结发谈兵事，微名占一经”。历史记忆与现实空间的重叠使其创作转向对文明兴衰的沉思。地理空间承载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触发诗人复杂情感的催化剂。空间移动的流动性特征催生了诗人对时空关系的哲学思考。频繁的地理位移使刘体仁对“归”与“离”的矛盾情感有深刻体验，这种情感冲突在《秋日携家游橡林》等颍州纪游诗中得到充分展现。“从唐初一来，朝官就把休沐田居看做朝隐的最好方式。”^[6]诗人通过构建空间叙事，将物理位移转化为情感流动的载体，形成以空间转换为线索的情感表达模式^[7]。这种流动性的空间体验并未导致情感表达的碎片化，反而促使诗人建立起以地理为坐标的审美认知体系，形成独特的空间诗学范式。

3.2 地理空间转移对诗歌意象的影响

刘体仁作为活跃于清代中后期的纪游诗人，其诗歌创作与地理空间转移存在密切关联。通过对其诗集中不同地域纪游诗的文本分析，可清晰发现地理空间的流动性对其诗歌意象系统产生了显著影响。空间位移带来的地理环境差异首先体现在自然意象的选择与重构上。江南水乡的创作多呈现“烟雨”“亭台”“渔火”等湿润温婉的意象群，而其宦游北方时则频繁出现“马嘶”“古戍”“猿猱”等具有苍凉特质的物象。这种意象类型的转变不仅源于气候地貌的客观差异，更反映出诗人对异质地理空间的感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调整。值得注意的是，刘体仁在空间转移过程中并未简单沿用地域特征符号，而是通过意象组合方式的创新实现审美表达的突破。例如其太原纪游诗将“秦岭”“栈道”等地理标识与“征衣”“烽火”等历史

意象并置,构建出兼具空间纵深感与时间厚重感的复合意象体系。

钟嵘《诗品》有言:“摇荡性情,形诸舞咏。”^[7]人文地理因素对意象系统的渗透同样值得关注。诗人在吴中地区游历时,常与友人相会,在一起主持风雅、把酒言欢。用“酒”“茶”“棋”等具有士大夫闲适特质的意象展现江南文人理想,而在经历辞官归隐后,诗中“乡里”“晚田”“对饭”等乡土文化意象逐渐增多。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地域特征罗列,而是通过意象的处理,将空间转移带来的文化冲击转化为诗意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刘体仁在空间位移中形成了独特的意象转换机制:当其辞官归隐时,诗中“田”“雁”“舟”等意象开始承载双重文化符号的叠加效应,既保留着当地地域特征,又融入归隐的情感元素,形成极具张力的意象对位结构。

情感意象的地理编码现象在刘体仁诗歌中尤为显著。其早年江南游历诗多用“云霞”“笛声”等明快意象,与轻松愉悦的创作心境形成同构关系;而经历空间动荡后的作品中,则频繁出现“残阳”“战马”“黄河”等带有漂泊感的意象,这些意象的选择与组合方式直接折射出诗人对地理空间的心理认知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刘体仁在空间转移中逐渐发展出意象的隐喻化倾向,将具体地理特征转化为情感载体。例如“征衣寒计日”在诗中不再单纯指涉气候现象,而是演化为承载羁旅愁思的象征性意象,这种意象的符号化过程正是地理空间对其诗歌风格产生深层影响的明证。

3.3 地理空间转移对诗歌语言风格的影响

当诗人宦游至江南地区后,地理空间的温润特质开始渗透至其语言系统。《八公洞》中的“坞深明茗火,冬暖种山樱”,可见其语汇选择转向对柔美意象的偏好。江南水乡的氤氲环境促使诗人将传统七言句式拆解为长短参差的节奏,通过“茗火”

“山樱”等复合意象的叠加,形成更具流动性的语言质感^[1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并非简单的地域特征移植,而是通过空间流动性重构了诗歌的感知维度——江南空间的平面延展性使诗人的观察视角从北方的垂直性(如“四面环山”“险峻华山”的垂直意象)转向水平延展的视觉体验,进而影响语言的空间表达方式。刘体仁在《真定城南与翼若别》中写道:“马嘶听渐远,人影出禾黍”,诗人对新空间的陌生化体验,使其语言产生触觉与视觉的错位组合。这种修辞策略实为地理认知差异的语言投射:荒凉的“马嘶”与村落间的“禾黍”本属对立意象,但在诗人笔触的感知中,两者在送别场景中实现并置,形成独特的陌生化效果。类似的矛盾修辞在空间转移期作品中大量出现,揭示出地理经验对语言常规逻辑的突破作用。

空间流动性还促使诗人建立多维度的语言参照系。比较刘体仁不同时期的纪游诗可见,北方作品多以单一线性叙事推进,而江南时期开始出现空间并置的复调结构。例如《秦淮竹枝词》中“几方栏槛几层楼,一处相逢一处愁”,通过时间与空间的叠映,在同一句式完成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对话。这种语言结构的变化,本质上是地理转移带来的多重视角融合,使诗歌语言获得超越单一地域经验的时空穿透力。从语言学视角考察,这种转变标志着诗人从地理空间的被动记录者,转变为通过语言重构空间意蕴的主动创造者。

空间转移对诗歌语言风格的影响呈现阶段性特征。在北方行旅阶段,诗风呈现古朴苍凉、豪迈奔放的特征。在南方游历时,诗人受江南地域文化浸润,诗风呈现出细腻婉约的抒情特质。在家乡颍州时,诗风清丽自然,充满对归隐的向往。空间位移过程中积累的多元文化经验,进一步促进了诗歌意象系统的重组与创新,使纪游诗从单纯的游历记录升华为对地理空间的文化阐释。

参考文献:

- [1] 李福文,刘体仁及其诗歌研究[D].西安:西北师范大学硕士文,2019.
- [2] (清)刘体仁著,王秋生点校.七颂堂集[M].黄山:黄山书社,2008.
- [3] (清)王士禛著,池北偶谈[M].山东:齐鲁书社 2007 年版.
- [4] (清)王士禛著,香祖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 [5] 唐小晶.论张妣谊的感怀诗[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院,2018(11).
- [6] 葛晓音.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 [7] 张怀瑾著:《钟嵘诗品评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